

网络媒体监督、反寻租与地方财政透明度

王银梅 罗建 郑铿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网络媒体监督与反寻租对地方财政信息化建设、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地方财政透明度为研究对象,以网络媒体对财政信息的负面新闻报道次数作为网络媒体监督的替代变量,以财政预算有关的腐败寻租案件数量作为中介变量衡量反寻租,选取2013—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媒体监督能有效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机制分析表明,反寻租是网络媒体监督影响地方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渠道。本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后发现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市场化指数较低、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表现出更强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应当重视网络媒体监督在政府预算公开中的作用,并通过叠加效应让反寻租在提升财政透明度中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财政治理体系;网络媒体监督;反寻租;财政透明度

中图分类号:F8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3)05-0057-10

一、引言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事业,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财政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现代政府治理的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财政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化。财政信息透明作为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能够缓解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公众的信息劣势,有助于更有效发挥公众对政府的外部监督作用,从而促进政府更好履行公共受托责任^{[1][2]}。随着新《预算法》的实施与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体上全国各地财政透明度提升明显^[3]。然而,我国财政信息公开仍然存在公开信息质量低、不全面、公布的政府预算信息难以为信息使用者有效使用、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4][5]}。因此,如何促进政府财政透明度进一步提高是建设现代财政制度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首先需要理清政府信息披露行为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

收稿日期:2023-03-3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反腐、公共权力约束与预算制度改革研究”(15BJY139)

作者简介:王银梅(1972—),女,湖北钟祥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罗建(1985—),男,湖北十堰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生;

郑铿城(1997—),男,福建漳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生,本文通讯作者。

利益相关者、制度与社会环境以及经济环境在推动国家政府透明度建设方面发挥主要的作用。政府的公开意愿以及公众对政府财政信息披露的需求是影响财政透明度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6][7]},在此基础上,制度改革与法律法规^[8]、外部因素刺激^[9]、信息技术与媒体^[10]等因素为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提供制度环境支撑和技术支持。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媒体与政府治理的应用结合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必然趋势,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媒体能够有效改善企业治理水平^{[11][12]},但少有文献将媒体与政府治理水平联系起来^[13],尤其是研究网络媒体监督在推动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方面能否发挥有利作用的文献更少见。

网络媒体监督作为一种新型的外部监督方式,在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方面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方面,独立性较强的媒体,能够通过信息网络对政府负面信息进行公开曝光,从而对政府形成舆论压力,促进政府更关注财政安排的合理性并推动财政信息的公开;另一方面,受当地政府限制,独立性较弱的网络媒体可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其监督效果难以显现。因此,网络媒体监督能否促进财政透明度提升有待检验,尤其是何种形式的网络媒体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其作用机制如何?探究这些问题,对优化网络媒体工具使用效果以及促进财政透明度进一步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尝试从网络媒体监督角度考查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效果及机制,以此寻找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新途径。本文以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为研究样本,使用财政信息公开后的媒体报道的负面新闻次数作为网络媒体监督的替代变量,并基于《中国地级市政府审计年鉴》《中国地级市政府统计年鉴》《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等相关数据,进行实证考察。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主要的贡献和创新在于,将外部监督与政府内部治理结合,从网络媒体监督和反寻租视角,揭示了网络媒体通过监督来促进财政透明度提升,且反寻租行为在该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同时,拓宽网络媒体与公共治理领域的研究与应用边界,为探索建立新形式的政府外部监督体系提供经验参照。文章后续安排为:第二部分理论分析和假设,第三部分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

现代政府治理理论框架下,政府与公众之间存着委托代理的关系,随之可能产生的问题是作为委托方的公众诉求与作为代理方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一致。财政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石,提高财政信息透明度是缓解上述委托代理关系中不一致问题的重要途径。从委托者的角度出发,提高财政透明度本身就是实现社会公众监督权力的重要条件。只有提升财政透明度,才能增强公众对财政运行状况的掌握与理解^[14],进而更好地实现对代理人的依法监督。另一方面,从代理者的角度出发,政府是否公开以及如何公开财政信息受到制度环境、经济环境以及自身财政公开意愿的影响^[15],尤其是在公开意愿上,政府官员的行为与廉政程度可能与财政信息的公开透明密切相关。

在处理公众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至为重要的是解决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网络媒体监督则提供了完善上述委托代理链条的途径。具体来讲,财政领域的网络媒体监督是指以网络作为媒介,以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的方式,对财政信息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曝光的一种监督方式。一方面,由于具备信息收集和传递优势,网络媒体能够代替公众发挥普通公众无法企及的监督效能。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具有独立性强、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能够从舆论力量上对政府形成较强的监督约束,从而影响政府行为。网络媒体的上述两大特征,正好可以弥补公众监督在实施过程中主体不明、动力不足和能力有限等缺陷。事实上,近些年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型的逐步深入,网络媒体监督逐渐成为我国国家治理建设中的重要问责机制^[16],随着对网络媒体监督的应用愈加广泛,其治理效果逐渐显现^{[17][18]},在这个过程中,对财政信息的网络媒体报道一方面会提高公众对财政信息披露的诉求——即监督意愿,另一方面则提高了公众理解财政信息的能力——即监督能力。总之,无论是监督意愿还是监督能力的提升,都会导致公众要求更为公开透明和全面及时的财政信息披露。基

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研究 H1。

H1:网络媒体监督有助于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

(二)反寻租:网络媒体监督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的中介机制

从反寻租到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提升。寻租理论认为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是阻碍地方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19],具体体现在,官员为寻租会阻碍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实现暗箱操作,从而最终降低财政透明度。我国实施全口径预算及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后,官员的行为基本都能在财政信息中体现,官员为了成功实施其寻租行为,必将会想办法提高其行为的隐蔽性。其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阻碍财政信息公开,降低政府财政透明度^{[20][21]}。如故意隐藏一些预算资金信息不对外公开,使得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内容大打折扣;以隐晦的形式公开,要么呈现出公众看不明白的模糊信息,要么呈现给公众看不懂的数据堆砌信息,降低预算信息的规范性、易懂性;在不显眼的位置公开或者在内部发个文件草草了事,降低财政信息的易得性等。反寻租提升财政透明度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反寻租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带来了很大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行动的开展,涉及寻租的地方政府官员相继落马,很大程度上扫除了地方财政信息公开的重要障碍。第二,反寻租可以产生威慑效应。反寻租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政治风气,减少地方官员为了寻租寻求暗箱操作而阻碍财政信息公开透明的动机,提高财政透明度;第三,反寻租可以形成蝴蝶效应。强大的反寻租压力之下,继任者或未被曝光的寻租者可能以提高财政透明度的行动,来向上级表明自己“为政清廉”的决心,甚至会为了提升政绩而主动公开财政信息,更容易响应国家要求。因此,反寻租可以提升财政透明度。

从网络媒体监督到反寻租能力提升。从反寻租的不同主体出发,客观上存在两条反寻租机制:一是国家反寻租机制,即国家权力系统内部依靠制度建设、分权制衡实现自我调节、自我限制,又称作制度反寻租机制;二是社会反寻租机制,即社会系统施加的外在压力,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又称为权利反寻租机制。反寻租的社会机制与国家机制并重,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22]。在网络化时代,反寻租的社会机制得到加强,社会公众参与反寻租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网络媒体进行权力监督,网络媒体是指在新浪、百度、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的相关负面报道,可以跨区域进行监督,有时还会被中央媒体、省级媒体或异地官方媒体转发,突破了传统媒体受限于“本级媒体监督本级政府行为比较困难”的难题而无法实施有效监督的困境,媒体监督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政府每个预算年度的预算信息公开后,网络媒体会及时关注,一是聘请业内专家对政府预算信息进行“询问式”解读;二是网络媒体自身带着“放大镜”的功效,从政府预算信息中找问题,并进一步曝光。针对网络媒体对预算信息的监督和社会问责,政府也会高度重视,进一步从政府自身找问题,存在寻租行为的官员得以曝光进而受到相应的问责。因此,网络媒体监督是政府提高反寻租能力的有力推动者。一方面,网络媒体报道有利于社会公众实现对政府财政信息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财政治理水平,实现从财政领域预防和治理寻租。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借助网络媒体对财政信息的曝光,更进一步深挖寻租官员,推行反腐败斗争,从而提升反寻租能力^{[23][24]}。综上分析,反寻租可以提升财政透明度;网络媒体监督可以抑制寻租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从而提高政府反寻租能力,最终进一步提升财政透明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

H2:网络媒体监督通过提高政府反寻租能力,进一步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布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是目前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地级市财政透明度连续性研究成果。它是由财政部统一要求编制的表格组成,指标口径具备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本文选用 2013—2019 年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报告》的市级财政透明度数据^①,主要理由为:(1)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现代预算制度建设目

标,对地级市政府的财政信息公开相关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市级财政是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改善民生的关键层级,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新形势下,提高财政透明度,建立责任、高效的市级政府势在必行。(3)市级政府财政预算披露标准化程度较高,影响因素也基本一致,以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为研究对象,能够保证本文数据分析的稳健性和代表性。

本文研究的时间区间为 2013—2019 年;由于海南省三沙市和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严重,城市样本为除海南省三沙市、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城市之外的地级市。政府进行内部治理后各个网络媒体的报道负面新闻的次数为网络媒体监督替代变量,网络媒体监督的数据通过百度搜索引擎进行全面检索得到;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地级市政府审计年鉴》《中国地级市政府统计年鉴》《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等。

(二)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我们构建主回归模型(1):

$$FT_{it} = \beta_0 + \beta_1 MEDIA_{it} + \beta_2 Control_{it} + \delta_i + \eta_t + \epsilon_{it} \quad (1)$$

在式(1)中,财政透明度(FT_{it})为本文主要的被解释变量。网络媒体监督($MEDIA_{it}$)为主要的解释变量。 $Control_{it}$ 为模型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地区教育水平、居民生活状况、政府财政赤字情况、地区人口规模等。 i 表示地级市地区, t 表示年份, δ_i 表示地级市城市固定效应, η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ϵ_{it} 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选取

1.解释变量。网络媒体监督($MEDIA_{it}$)为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对各个网络媒体对地级市财政监督的负面报道进行收集和整理^[25]。主要采用网络搜索方式,以地级城市名称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进行全面检索,通过人工归纳、整理、筛选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涉及的关键词列表;然后再将关键词列表和地级市城市名称形成组合,在百度新闻和新浪微博中进行检索,提取媒体报道数量和转发数量,并下载媒体报道文本;通过人工甄别方式阅读下载的媒体报道文本,剔除简单描述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并未提出任何质询的新闻与微博,确定网络媒体对财政信息公开的负面报道事件,形成负面报道事件列表;最后,将媒体负面报道事件、报道数量与转发数量归并,形成数据样本集。

2.被解释变量。地方财政透明度(FT_{it})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以 2013—2019 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中的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得分作为衡量指标。

3.机制变量。反寻租($ReReet_{it}$)为本文的中介变量,通过查找各个地级市曝光的腐败寻租案件,提炼整理出与财政预算相关的腐败寻租案件。反寻租是政府内部控制的一种表现,与网络媒体监督不同,网络媒体更多是一种外部治理。寻租会影响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经济社会发展^[26],积极有为政府也应当构建反寻租体系^[27]。因此,纳入反寻租作为研究机制进一步探讨。

4.控制变量。本文借鉴了相关学者文献,选取如下控制变量,且均为相对数。(1)对外开放情况(FDI_{it})。为了减少投资风险,外商在选择投资环境时,通常会倾向选择透明度高的环境,因此,对外开放情况是衡量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指标^[28]。本文将市级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级市 GDP 的比重作为对外开放情况的衡量指标^[29]。(2)互联网发展水平(NET_{it})。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会影响地级市政府财政信息披露^[30]。本文选用各地级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人口数量占地级市总人口数量的比重来衡量互联网的发展水平。(3)税收收入情况(TAX_{it})。税收收入也是影响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的重要因素,可能会刺激政府提高财政透明度^[31]。本文选择地级市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作为控制变量。(4)地区居民生活状况($ENGEL_{it}$)。地区居民生活状况会影响居民的参政议政意识,进而影响地级市政府财政信息披露^[32]。本文选用各地级市的恩格尔系数作为控制变量。(5)地区教育发展水平(EDU_{it})。地区教育发展水平会影响居民的参政议政意识,进而影响地级市政府财政信息披露^[33]。本文选用各地级市的教育经费支出总额占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6)城市化率($URBAN_{it}$)。城镇化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34]。基于此,将这些因素设置为控制变量,主要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定义和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地方财政透明度	FT_{it}	t 期各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得分
解释变量	网络媒体监督	$MEDIA_{it}$	t 期网络媒体报道的各地级市财政负面新闻数
中介变量	反寻租	$ReReet_{it}$	t 期各地级市政府财政预算相关的腐败寻租案件
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情况	FDI_{it}	各地级市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级市 GDP 的比重
	互联网发展水平	NET_{it}	各地级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人数占地级市总人口的比重
	税收收入情况	TAX_{it}	各地级市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的比重
	地区居民生活状况	$ENGEL_{it}$	各地级市居民恩格尔系数
	地区教育发展水平	EDU_{it}	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比重
	城市化率	$URBAN_{it}$	地方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表 2 报告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 2 可以看出,各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得分的平均值为 40.608,标准差为 20.255,最大值为 86.514,最小值为 0.021。网络媒体报道的各地级市政府负面新闻数的平均值为 12.741,标准差为 17.338,最大值为 245,最小值为 0。各地级市政府腐败案件数的平均值为 11.567,标准差为 13.009,最大值为 77,最小值为 0。这说明在不同地级市,财政透明度、网络媒体监督和腐败案件数都存在差异。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T_{it}	2030	40.608	20.255	0.021	86.514
$ReReet_{it}$	2030	11.567	13.009	0.000	77.000
$MEDIA_{it}$	2030	12.741	17.338	0.000	245.000
FDI_{it}	2030	0.332	0.351	0.285	0.417
NET_{it}	2030	0.379	0.331	0.115	0.883
TAX_{it}	2030	0.658	0.692	0.521	0.827
$ENGEL_{it}$	2030	0.337	0.075	0.110	0.741
EDU_{it}	2030	0.126	0.133	0.073	0.215
$URBAN_{it}$	2030	0.549	0.144	0.124	0.977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3 给出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4)分别表示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无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地点固定效应和双固定效应模型。从不同模型的实证结果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网络媒体监督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表明网络媒体监督的加强有助于提升财政透明度,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 H1 成立,即网络媒体监督能够促进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种是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对缩尾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二种是剔除 2015 年新预算法发布对实证结果的干扰,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决定》,并重新颁布了修改后的预算法,新预算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考虑到实施当年会对财政透明度有较大的冲击,故删除 2015 年所对应的数据;第三种是将被解释变量财政透明度滞后 1 期进行回归;第四种是删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这些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都较好^[28],其财政透明度、网络媒体监督都显著高于其他地级市,因此,将以上城市样本删除再进行实证。网络媒体监督对财政透明度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分析实证结果如表 4 所示。从表 4 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且都在 10% 及更小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变化并未出现较大波动,表明模型通过稳健性检验。

表 3

基准回归统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MEDIA _{it}	0.6628 *** (9.04)	0.4681 *** (5.52)	0.5133 *** (7.22)	0.4304 *** (3.15)
FDI _{it}	0.0923 (1.14)	0.1194 ** (2.38)	0.0335 * (1.64)	0.0129 ** (2.53)
NET _{it}	0.0522 (1.08)	0.0997 ** (2.55)	0.0881 * (1.69)	0.0772 ** (2.09)
TAX _{it}	0.2766 *** (4.31)	0.0721 ** (2.24)	0.1193 *** (3.52)	0.0914 *** (3.62)
ENGEL _{it}	0.1879 *** (4.09)	0.1507 *** (3.88)	0.0664 * (1.72)	0.0553 * (1.71)
EDU _{it}	0.3663 *** (6.28)	0.1879 *** (4.21)	0.0571 *** (4.21)	0.0395 *** (3.87)
URBAN _{it}	0.2209 *** (4.11)	0.0909 *** (3.55)	0.0651 *** (5.39)	0.293 *** (4.25)
常数项	0.8584 *** (12.87)	0.4962 *** (5.41)	0.8276 *** (6.93)	0.7663 *** (6.11)
年份固定	否	是	否	是
地级市固定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2030	2030	2030	2030
R ²	0.7004	0.2371	0.5213	0.6602

注:其中*、**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1)、(2)内的值均为z值,(3)、(4)内的值均为t值,聚类估计采用地级市层面聚类,下表同。

表 4

网络媒体监督对财政透明度的稳健性检验

	(1)	(2)	(3)	(4)
	对数据缩尾处理	剔除新预算法发布 对应年份数据	地方财政透明度 滞后1期	剔除直辖市、省会和 副省级城市数据
MEDIA _{it}	0.4228 * (1.91)	0.4432 ** (2.21)	0.4552 *** (6.38)	0.4161 ** (2.4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30	1740	1740	1785
R ²	0.4823	0.5288	0.6985	0.4717

(三)内生性检验

网络媒体监督与财政透明度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表现在网络媒体监督越强的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而财政透明度越高的地区,也会要求提高网络媒体监督水平。变量间反向因果关系的存在会对模型的稳健性产生影响,是模型内生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此,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该方法可用于解决内生性问题。GMM方法一般可分为差分GMM和系统GMM两类,其中,差分GMM是对基本模型进行一阶差分去掉固定效应的影响,采用一组滞后的解释变量作为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分析^[29]。系统GMM是相对于差分GMM的进一步优化,本文分别用这两种方法进行模型估计,所得到的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

表5为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内生性检验,模型(1)为差分GMM的估计结果,模型(2)为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从表5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差分GMM与系统GMM中的AR(1)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存在一阶自相关,AR(2)的P值均大于0.05,表明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可以接受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且Sargan均大于0.05,表明所有的工具变量均有效,表明GMM估计方法在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影响的估计是有效的。滞后1期的地方财政透明度对当

期的地方财政透明度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同时,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也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见,通过系统 GMM 模型和差分 GMM 模型可有效缓解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内生性问题,也证实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之间促进关系。

(四) 异质性分析

考虑采用不同市场化指数和不同营商环境对样本城市进行分组。其中,市场化指数的指标来源于樊纲等主编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值,该指标可以衡量各个地级市市场化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基于 2013—2019 年各地级市市场化总得分数据,将市场化指数得分均值以上的城市定义为市场化指数较高的城市将市场化指数得分均值以下的城市,定义为市场化指数偏低的城市,以此对地级市样本数据进行市场化水平分组。对于城市营商环境指标,参考《2019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本文将排名在前 100 的城市定义营商环境较好的城市,其他城市定义为营商环境较差的城市,以此对地级市样本数据进行营商环境分组。基于以上分组,考察模型回归结果的异质性,所得结果如表 6 所示。表 6 中,分别从不同市场化水平和不同营商环境水平对地级市城市进行划分,实证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正,在 1% 和 5% 水平上显著,且市场化指数低、营商环境较差的城市,网络媒体监督对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效果更好。这进一步表明,在市场化指数低、营商环境一般的地级市,更应当重视网络媒体监督所发挥的功能。

表 6 网络媒体监督对财政透明度的异质性检验

模型	(1)	(2)	(3)	(4)
异质性	市场化指数较高	市场化指数较低	营商环境较好	营商环境较差
MEDIA _{it}	0.3722* (1.83)	0.4709*** (3.18)	0.3407* (1.74)	0.4893*** (4.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91	1239	700	1330
R ²	0.3394	0.3721	0.2866	0.3058

(五) 机制分析

本文检验了网络媒体监督力度的加强会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为了进一步验证反寻租在其中的传导机制,本文借鉴温忠麟等相关学者方法^[35],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在式(1)的基础上,构建式(2)与式(3),当 α_1 与 γ_2 都显著时,说明反寻租在网络媒体监督提升财政透明度的过程中起到中介效应,当 γ_1 也显著的时候,表明该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

$$\text{ReReet}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MEDIA}_{it} + \alpha_2 \text{Control}_{it} + \delta_i + \eta_t + \epsilon_{it} \quad (2)$$

$$\text{FT}_{it} = \gamma_0 + \gamma_1 \text{MEDIA}_{it} + \gamma_2 \text{ReReet}_{it} + \gamma_3 \text{Control}_{it} + \delta_i + \eta_t + \epsilon_{it} \quad (3)$$

由上文可知,反寻租采用地级市政府腐败案件数进行反映,所得的实证结果如表 7 所示。从表 7 结果来看,系数均在 5% 水平和 1% 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反寻租是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影响的重要传导渠道。并进一步采用 Sobel、Bootstrap 两种方法进行检验,实证发现,Sobel 检验在 1% 的水平上具显著性,Bootstrap 检验对样本采取重复抽样后,其直接和间接效应都显著,证明了中介效应的存在,且为部分中介效应,即网络媒体监督通过提高政府反寻租能力,进一步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从而本文研究假设 H2 得到验证。

表 5 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差分 GMM	(2) 系统 GMM
L1.FT _{it}	0.1235*** (3.94)	0.1302*** (4.05)
MEDIA _{it}	0.3992** (2.31)	0.4285** (2.35)
控制变量	是	是
AR(1)	0.0000	0.0000
AR(2)	0.6511	0.7014
Sargan	0.5823	0.6192
观测值	2011	1906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网络媒体监督和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之间的关系。基准回归研究发现:网络媒体监督能有效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稳健性检验发现: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删除2015年新预算法发布所对应的年份数据,将财政透明度滞后1期处理,以及删除直辖市城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旧显著,模型具有稳健性。

内生性分析部分,通过差分GMM和系统GMM检验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化指数较低的城市、营商环境较为一般的城市,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效果越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反寻租是网络媒体监督影响地方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渠道。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启示和政策建议:(1)进一步挖掘网络媒体监督的潜力,充分发挥其在政府预算公开中的作用效能。应结合不同市场化区域、不同营商环境区域的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发挥网络媒体监督的作用。在市场化与营商环境较差的区域,更应当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网络覆盖普及率。(2)在加强反寻租与政府财政透明度工作力度的同时,注重协同作战形成合力,通过叠加效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反寻租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作用进行验证,发现反寻租可以有效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这也启发我们可以利用统战思维促进反寻租和加强政府财政透明度建设协同作战,促使两者形成合力,发挥更大的作用。(3)地区发达程度会影响政府财政透明度,还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促进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本文通过设置控制变量进行实证考察时发现,对外开放情况、互联网发展水平、地区居民生活状况、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城镇化率等体现地区发达程度的变量也会影响政府财政透明度。因此,有必要鼓励各地方大力发展经济、提高教育水平、推进城镇化建设等,以发展带动政府财政透明度提升,以财政促地区发展,形成财政与地区经济的协同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网站:<https://www.sppm.tsinghua.edu.cn/xycbw/yjbg.htm>.

参考文献:

- [1] 龚锋,邓龙真.财政透明的治理效应研究[J].财政研究,2023,480(2):53—67.
- [2] 刘俸奇,储德银,姜春娜.财政透明、公共支出结构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J].经济学动态,2021,722(4):107—123.
- [3] 肖鹏,樊蓉.债务控制视角下的地方财政透明度研究——基于2009—2015年30个省级政府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19,437(7):60—70.
- [4] 孙文基.公共治理和政治民主:我国政府预算透明问题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8):84—88.
- [5] 邓淑莲,温娇秀.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10):3—9.
- [6] 魏志华,林亚清,周雄.财政透明度问题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7,673(3):136—149.
- [7] 朱颖,赵颖博,邓淑莲等.公众诉求与地方财政透明度——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18,44(11):90—105+124.
- [8] 郭玲,汪洋.财政透明、预决算收入偏离与预算环境——基于2015年《预算法》的双重差分和合成控制分析[J].当代财经,2021,435(2):27—37.
- [9] Andreula, N., Chong, A. Do Good Institutions Improve Fiscal Transparency? [J].Economics of Governance, 2016, (17):241—263.

表7 网络媒体监督对财政透明度的机制检验

模型	(1)	(2)
	反寻租(ReReet _{it})	地方政府透明度(FT _{it})
MEDIA _{it}	0.9746 ** (2.11)	0.3891 *** (7.08)
ReReet _{it}		0.1165 *** (4.64)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地级市固定	是	是
观测值	2030	2030
R ²	0.6443	0.5301

- [10] 魏陆. 全口径预算信息公开透明保障机制构建研究[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24(2): 5—12.
- [11] 张绘. 公共预算管理衔接性不足与政策建议[J]. 财会月刊, 2023, 44(7): 142—148.
- [12] 周开国, 应千伟, 钟畅. 媒体监督能够起到外部治理的作用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违规的证据[J]. 金融研究, 2016, 432(6): 193—206.
- [13] 刘伯凡, 赵玉兰, 梁平汉等. 政务新媒体与地方政府信任: 来自开通政务微博的证据[J]. 世界经济, 2023, 46(5): 177—200.
- [14] 朱颖, 赵颖博, 邓淑莲等. 公众诉求与地方财政透明度——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财经研究, 2018, 44(11): 90—105+124.
- [15] 李红霞. 让政府预算在阳光下运行: 预算公开透明的思考[J]. 财政研究, 2011(1): 18—19.
- [16] 马骏. 实现政治问责的三条道路[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5): 103—120+222.
- [17] 储德银, 孙梦. 财政纵向失衡、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21(4): 34—48.
- [18] 王会金, 马修林. 政府透明度、媒体监督与政府审计绩效——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17, 14(3): 86—94.
- [19] 陈裔金. 设租与寻租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 经济研究, 1997(4): 66—73.
- [20] 马骏, 林慕华. 中国城市“钱袋子”的权力: 来自 38 个城市的问卷调查[J]. 政治学研究, 2012(4): 111—125.
- [21] 庞保庆, 邓淑莲, 刘红芹. 官员晋升、部门权力与财政透明度[J]. 学海, 2018(3): 109—116.
- [22] 郭理蓉, 孟祥微. 自媒体时代反腐败的社会机制及其与国家机制的衔接[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42(2): 116—122.
- [23] 邱杭宁. 论权力制约与根治腐败[J]. 苏州大学学报, 1998(1): 50—54.
- [24] 黎文靖. 所有权类型、政治寻租与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一个分析性框架[J]. 会计研究, 2012(1): 81—88+97.
- [25] 张琦, 吕敏康. 政府预算公开中媒体问责有效吗? [J]. 管理世界, 2015(6): 72—84.
- [26] 陈兴, 韦倩. 寻租活动、行政距离与政府补助——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 65—72.
- [27] 后小仙. 基于博弈分析的政府采购反寻租目标体系构建[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7(6): 30—34.
- [28] 钟覃琳, 陆正飞. 资本市场开放能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吗? ——基于“沪港通”效应的实证检验[J]. 管理世界, 2018, 34(1): 169—179.
- [29] 吴唱唱, 张辉.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进口贸易发展视角[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3, 27(2): 101—112.
- [30] 上官泽明, 赵晓艳, 牛富荣. 互联网发展、制度环境与财政透明度[J]. 财政研究, 2020(10): 74—88.
- [31] 黄寿峰, 董一军, 胡乐轩. 税收竞争、财政透明度和非税收入——来自我国市级层面的证据[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60(4): 117—127.
- [32] 张曾莲, 盖亚洁. 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基于 2006—2014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8, 40(7): 16—31.
- [33] 黄纪强, 祁毓. 环境税能否倒逼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基于环境“费改税”的准自然实验[J]. 产业经济研究, 2022, 117(2): 1—13.
- [34] Arellano, M., Bond, S.,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58): 277—297.
- [35]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5): 614—620.

Online Media Monitoring, Anti-Rent Seeking and Local Fiscal Transparency

WANG Yinmei LUO Jian ZHENG Kengcheng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Online Media Monitoring and anti-rent seek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the modernis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governance system. This paper takes local fiscal transparenc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akes the number of negative news reports on fiscal information in the media as a proxy variable for online media monitoring, takes the number of corruption and rent-seeking cases related to the fiscal budget as a mediator vari-

able, and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prefectural cities in 2013—2019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online media monitoring on local fiscal transparency. It was found that online media monitoring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local fiscal transparency. The mechanism study shows that anti-rent seeking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through which online media monitoring affects local fiscal transparency. Based on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endogeneity analyses, the study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nclusions still hol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online media monitoring exhibits a stronger promotion effect on local fiscal transparency in areas with lower urban market-oriented indexes and poorer business environments.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online media monitoring in government budget disclosur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anti-rent-seeking effect should be made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enhancing fiscal transparency through the superimposed effect.

Key words: Fiscal Governance System; Online Media Monitoring; Anti-Rent Seeking; Fiscal Transparency

(责任编辑:肖加元)

(上接第 56 页)

Does “Business Tax Replaced with VAT”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WANG Hongming¹ SUN Pengbo¹ YANG Chen²

(1.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Jiangsu Indust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objective of "stable growth", how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of macro policy adjustment and the cultivation of new digital growth drivers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common concern for academia and policy makers. Taking the "business tax replaced with VA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s the triple difference method (DDD) to investigate its effect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business tax replaced with VA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business tax replaced with VAT" not only reduces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 of enterprises, improves the degree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demand for service outsourcing, but also promotes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accelerates the update iteration of equipment, thus boos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business tax replaced with VAT" promot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mature enterprises,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more obvious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direction, "business tax replaced with VAT" helps enterprises achieve deep transformation to the direction of underlying technology. The expanding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can produce ripple effect, driv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downstream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curr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 system reform.

Key words: "Business Tax replaced with VAT ";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ipple Effect

(责任编辑:肖加元)